

空域背景的严重缺失

——从《连心锁》看文革抗战文学有关朝韩想象的浅泛性

澳门大学中文系 朱寿桐

Heavy deficiency for the Area Background:
Viewing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Heart-to-Heart Lock* and Its Imaging about
Korea

Zhu Shout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Macau)

The fiction *Heart-to-Heart Lock* (*Lian Xin Suo*, written by Ke Yang and Ge Ji)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about Kore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are a lot of heroes from Korea, especially Xu Zhefeng, An Rongshu and Piao Chengmo, from whom we can't discriminate their political thoughts, the feelings to fatherland, even feelings to the leader like Chairman Mao (Mao Zedong) from Chinese heroes. They look like Chinese more than Korean in the fiction. The Writers had not any experience in Korea, and they were not also conscious that they needed to embody the Korean heroes with the area background of Korea. A heavy deficiency for the Korean area background is the main defect of the fiction.

Keywords: Area Background, *Heart-to-Heart Lock*, Imaging about Korea

—

朝韩¹与中国具有许多共同的历史命运，其荦荦大端者即都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都进行过英勇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在这场战争中有过唇齿相依、水乳交融式的联合。可惜，一直到长篇小说《连心锁》出版之前，对中国与朝韩联合抗战这样一段难忘的历史很少进行较大规模的文学表现，文学表现中不可谓不多的涉及朝韩的题材一般集中于抗美援朝战争，最著名的如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电影《奇袭》和长篇小说《剑》等。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连心锁》的文学史地位显赫而独特。

克物、戈基合作的这部小说以满腔的热忱和那个时代必具的革命激情，表现并讴歌了抗日游击战争中以许哲峰为代表的一群朝鲜军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辉煌历史。这部小说的作者克物，原名薛克物，安徽来安人，1939年参加新四军，1963年毕业于南京

¹ 所论小说中一律以朝鲜指称所刻画的主要人物的种族和国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官方则多称“韩国”、“韩族”。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团委发布〈告全满洲韩国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见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又，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亦号召各民族“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联合起来，见《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综此，为稳妥起见，本文以“朝韩”概指，以免偏颇。

军事学院，曾任新四军十团一营书记员，后官至第二十四军副参谋长，兰州军区创作组副组长。戈基本名杜承龙，浙江东阳人。1943年肄业于东阳师范学校。1949年入伍，曾任二十一军一八三团美术干事，志愿军一八三团通联干事，二十一军政治部文艺助理员，后成为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连心锁》在文革前的1962年便已出版，1964年曾获得北京军区优秀作品奖，作者荣立三等功一次。这部作品的定本则是1972-1973年出版的重版本，按出版说明：“这次重版，作者根据工农兵群众的意见作了重要修改”，其发行总数应在近千万册。²

在文革中“根据工农兵群众的意见”修改的小说理所当然地带着文革文学的惯有烙印，只不过是，文革文学的那种鲜明的烙印由于体现在中朝军民并肩抗日这一特殊的题材上，印刻在许哲峰等朝鲜军人这些特殊的人物身上，因而在这部小说中就显得颇为独特，有时显得特别怪异。通过文学表现和讴歌中朝军民并肩抗日的英雄壮举当然无可指责，但在这部特殊的作品中显露出的文革文学规范乃至潜规则所造成的种种怪异同样需要加以学术分析。文革文学的规范和潜规则基本是从观念和类型化出发，严重影响着作品真实精神的体现和人物真实性的塑造。《连心锁》从观念和类型化出发的后果体现在对朝韩想象的浅泛性，对中朝友谊和朝鲜军人形象把握的浅泛性，进而导致对于中韩两国抗日战争把握的浅泛性。这种浅泛性常常显露出对真实性的拒绝。一个涉外题材的作品要想生动地体现出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须带着浓厚的具有异域色调的空域背景，而无论是从写作行为还是从人物刻画方面看，这部作品都严重缺失这样的空域背景，致使其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思想把握、生活把握和人物把握都呈现出浅泛性的缺陷。

抗日战争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朝韩都是刻骨铭心的民族壮举，任何肤浅的认知和浅泛性的描写都可能对这种历史的深刻性构成一种残损与伤害的力量。虽然学术承担不了修补的责任，但尽可能指出这种浅泛性及其可能对历史构成的残损与伤害，是对《连心锁》这样的作品进行学术解剖和阐释的必要性之所在。

二

《连心锁》的创作主旨是刻画和塑造朝鲜军人在中国加入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英雄壮举，与那时候一般的抗战文学有明显的区别，题材和人物都显示出明显的国际性——就这部作品而言，应该具有浓厚的朝韩意味。出版提要明确了这样的主旨：“这部小说，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农村为背景，描写我新四军部队中的几位国际主义战士——朝鲜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中国人民一道，在极其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下，英勇机智，团结战斗，依靠群众，克敌制胜的故事。”在列举小说的人物阵容时，则谓“着力刻划了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许哲峰、安蓉淑、朴成模和方炜、刘大娘、刘大嫂等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形象。”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内容提要”写得很欠水平——既然有了“同中国人民一道”，后面的“依靠群众”就是明显的重复，人物阵容的列举则严重失误，小说中的刘大娘、刘大嫂无论是社会角色还是文学角色都不能与刘喜、刘杰等英雄相比，但在此提要中却莫名其妙地被凸现出来，而刘氏兄弟居然不见踪影。不过这份糟糕的提要毕竟以出版者和作者的双重代表的身份阐明了小说的主旨，那便是朝鲜军人的抗战业绩与国际主义精神。因此，为了凸显许哲峰这个国际主义战士和朝鲜军人的光辉代表，作为部队党的领导人形象的方炜被出人意料地处理成次要人物，这种人物处理方式恐怕那时只有在涉外题材中才会出现也才能被允许。

然而，这部小说无论从人物的生活习性还是从人物的气质特性，都没有刻画出朝鲜抗日英雄的精神内涵，所有的仅仅是一些外在的语言现象能够点缀出他们的民族背景，而且即便是能够表现其朝鲜族人特色的最外在的朝鲜语言表达，也稀少得可怜。整部作品共有三处采用了朝鲜语烘托或写真性描写。一开始是新四军某部通讯班长以朴成模“巴力！”吆喝着催马疾行，中间是这位小朴与老处长老柳唱《桔梗谣》：“道拉吉，道拉吉，道拉啊……吉……”最后则是尾声部分，抗日战争胜利数年后已成为前敌联合手术部主任的梅繁在朝鲜生孩子，她被朝鲜的“阿妈妮”金大娘亲切地称为她的“中国姐儿”，当她顺利产下一个男孩以后，金大娘兴奋地对告诉刘杰和周围的人：“昭斯米达！乃木扎！”

²见 1973年10月山西人民出版社第3版的《内容提要》。此版的第3次印刷印数为1,000,000册，此后历年印刷、发行，直至1979年有关此小说的连环画还在出版。

意为“好啊，是个男孩”。这里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朝鲜语，鲜明地点缀了在朝生活氛围。通过语言作这样的氛围点缀本来就非常生硬，然而即便是如此生硬的点缀页整部小说中也极为稀少，而且有时候显得极不真实。如果说金大娘在欢欣之余脱口说出朝鲜话对刘杰等表示祝贺，那还显得较为自然，则朴成模一开始出场策马扬鞭用朝鲜语吆喝催马，就显得不合情理。首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朴成模的坐骑是他自己从小训练出来的，如果这匹马的训练者是一般中国人，则吆喝它用朝鲜语不应该奏效；其次，小说一开始已经说明，这批朝鲜军人在中国军队里的民族身份并不鼓励公开。按照作品中小朴的说法：“去年秋天，我们的一中队长老崔无意中泄露了秘密，结果弄得地方政府、驻地群众请客、慰劳，工作给误了很多。”因此，不公开朝鲜同志的身份是为了不给地方和群众增添麻烦。其实，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在复杂的战争环境里，作为外国军人与中国人并肩作战，很多场合似乎也不便公开他们的身份。再次，通讯班长小朴从事的是与紧急军情相关的情报递送工作，在陌生的和情况不明的地段暴露出自己是朝鲜人的身份就更加危险。因此，朴成模这时候用朝鲜语催马扬鞭，除了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一国人身份而外，所起的主要作用似乎就在于暴露写作的粗疏和生硬的卖弄。

关键还不在于小说表现外在的朝鲜生活气息和人物信息如此生硬和虚假，而在于作者不懂得通过空域背景的描写刻画人物的人生环境和心理环境，使得人物和情节在合理而浓烈的空域背景下展示或展开，从而赢得立体的、生动的艺术效果。其实，不单是作家没有这种营造空域背景的文学写作意识，便是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大多也没有意识到空域背景对于文学写作和文学作品解读的重要意义。文学研究早就重视文学的时代背景，而相对忽略了文学的空域背景。其实文学创作同人的其他行为一样，都脱离不了一定的时空条件；文学创作的内容也同人们的生活相类似，反映着一定时空的内涵与因素，因此，文学研究只注重文学内容及创作活动本身的时代背景而忽略空域背景，是一种不为人知的缺失。

所谓文学创作的空域背景是指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空间和地域背景，同时代背景一样，有时为作品所正面呈现，有时则是作为作家构思的隐匿因素在起作用。正像时代背景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态度和价值判断一样，空域背景也同样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作品中显露出来的或直接呈现的空域背景属于显性的空域背景，没有在作品中直接显现的空域因素却潜隐地作用于作家创作构思，则属于隐性的空域背景。

就小说《连心锁》而言，由于表现的题材具有国际抗日战争背景的特殊性，特别是以在华参战的朝鲜军人为主要人物形象，作品若须富有相应的内涵，就需要有意识地刻画人物和故事情节的空域背景，包括显在的和隐性的空域背景，从而强化生活气息和人物合理的精神风貌，使得作品无论是呈现的人物形象还是情节内容都避免浅泛甚至虚假。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朝鲜语这种特别外在的语言色彩点缀作品的涉外风貌显得非常浅泛且柔弱，必须将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思想情感甚至思维内涵置于显性的或隐性的朝韩空域背景之中，才可能将人物刻画得富有立体感，将故事情节表现得真实、丰富而生动。

三

应该说，除了运用有限的语言点缀而外，《连心锁》的作者注意到用朝鲜生活场景这种显在的空域背景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的来历。在朝鲜军人人物群象的刻画中，除老柳处长的来历没有明确交代而外，主要英雄人物许哲峰、安蓉淑、朴成模的来历都带着朝鲜生活的血泪。问题是，由于作者对朝鲜生活的疏隔以及特定年代对革命者人生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把握，无论是反映许家和安家的革命史还是表现朴家的血泪史，都不具备朝韩生活的特性，而只是中国任何一个乡镇所惯有的浴血奋战或苦大仇深的故事翻版，朝韩的文化气息更无从谈起，便是政治性的反抗和革命也与中国那时候耳熟能详的故事如出一辙。这种正面的朝韩生活场景德展现，由于缺少朝韩的人生韵味，缺少相应的民族色调和地域色彩，显得极其平面和一般化，因而给读者的感觉不仅没有生活的纵深度和生动性，而且也很少丰富性和真实感。

小说“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农村为背景”³，这是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展开的主要场景，对于远离祖国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朝韩抗日英雄来说，他们时时刻刻在内心里

³ 见本书《内容提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都应该印刻着祖国的背景，这样的背景即使不体现在他们的语言表述上，也应该深入到他们的情感和思维深处，成为笼罩着他们思绪的一片阳光和一派浓雾，这样才使得作品显示出巨大的真实性和题材的个性。但或许是创作者当时的政治认知所制约，或者是他们的历史认知所导引，人物刻画中即便是显现出披露这种朝韩空域背景的苗头，作者也会使用一种政治橡皮将其揩擦殆尽。小说开始不久写到朝鲜军人所在的新四军大队第一次战斗动员，先做动员的是大队长许哲峰，只见他抽出马刀，厉声向他的全体部队喝问道：“这是什么？”大家回答是军刀，接着的问题是用来干什么的，回答自然是杀敌人，可当他问“为了谁？”之后，部队众口一词的回答是：“祖国，人民！”接着教导员方炜讲话，发出号召：“进入战斗之后，希望同志们，把仇恨的力量集中到刀刃上去，坚决向敌人讨还血债，为祖国为同胞们报仇！”

这里存在着一个空域背景纠结不清的问题。在这支英雄的队伍中，朝鲜军人在数量上占的比重很小，虽然出现在其中的朝鲜军人一个个都是被突出的英雄；大部分是中国战士的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将国家称为“祖国”，这显然有些特别甚至虚假，应该是朝鲜同志非常自然地想到自己远离的祖国才会如此清晰地称呼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从朝鲜军人的立场和意念出发设计的，但作者却将它“强加”给中国士兵和干部。方炜的战斗动员就更显得莫名其妙，要同志们“为祖国为同胞们报仇”，这样的话用来勉励朝鲜同志才合适，用在中国抗日军人的身上，则令人误解为其所在空域是中国以外的战场。一般而言，汉语中的“祖国”一词具有强烈的故国空域背景，常常表明说话人的现场空域与故国空域的不统一，于是，小说忆述许哲峰17岁第一次杀死鬼子时的所思所想：“正是这些魔鬼在屠杀祖国同胞和中国人民！”这里的“祖国”指称才很准确且具有空域背景内涵。

如果小说始终保持如此清醒和清晰的空域背景意识，在刻画和表现朝鲜军人的情感与思绪的时候有着鲜明的与中国军人相异的故国情怀甚至流寓意识，则小说会显得丰富许多，生动许多，同时也将更加真实，更加富有魅力。问题是，小说作者在创作中不是力图强化这样的异域意识或朝鲜军人的祖国情怀，而是着力涂抹甚至刻意改变、删除这样的情怀，使得这些人物本应具有的甚至应该是刻骨铭心的特定的空域背景变得非常模糊甚至渐趋乌有。在这批朝鲜军人的意识中，自己的故国背景甚至自己当年的战斗经历，凡是与“此在”的新四军抗日游击战争无直接关系的，似乎都在遗忘之列。许哲峰的少年往事，包括在东北要求参加抗日义勇军，因为年龄如何被马队长所拒绝，后为了表示抗日决心如何只身冒险杀鬼子，终于得到参军的允许，这些本来都已经被尘封于记忆的深处，现在回想起来则完全是因为刘杰这个小伙子要求参军的情形所唤起。还是那个小八路刘杰，以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执着、好奇追问朴成模的身世与战斗经历，使得小朴想起了自己的过去，想起了老父亲，“想起了村后满是青松的凤凰山，”，因此，小朴嗔怪刘杰说：都是因为他“害得我想家睡不着觉。”言下之意，如果不是这个捣蛋鬼的追问，自己的过去，家乡的老父以及故国的凤凰山，则早已经被他遗忘在无意识的深处。诸如此类有关忘却的描写和叙述，一定程度上涂除了人物内心的故国情怀，人物情思应有的空域背景被悬置甚至被删除，这不仅使得人物形象内涵浅泛，缺少应有的感动力，而且使人物形象以及人物关系变得非常虚假和不符合逻辑。

四

从抗日战争的血与火书写中韩人民的血浓于水的情谊，不仅是正确的、正义的而且是珍贵的创作行为，但影响这种创作使之显示出生硬、浅泛甚至虚假的现象，乃是一定的政治理念及其不恰当的运用诸因素。从创作来说体现这种消极影响的政治因素既有历史的成分，更多的是文革写作语境的现实内容。

《连心锁》生硬、浅泛和虚假现象的形成，主要是在表现朝鲜军人的伟大胸怀时，最大限度地忽略甚至有意抹杀了其应有且应非常深刻的故国情怀和祖国空域背景的描写，这部小说将朝鲜军人与中国新四军将士在政治上趋同化，完全不承认他们之间的民族差异性，这使得这部国际主义文学作品无法炫耀其特有的光泽，在许多主要方面都与任何一部文革文学相雷同。从作品中中国军民的观感来看，朝鲜同志的英勇顽强和无私品德并没有任何民族的分别，当许哲峰领导他的部队打击日寇宣告大捷之时，新四军根据地的刘家郢民众是这样赞扬许大队长的：“你看那许大队长，一口刀，一匹马，就好比当年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以中国古代的英雄比喻许哲峰，正体现了中国民众对朝鲜军人不分彼此的亲密感情。而且，他们从内心里就没有把许哲峰这批朝鲜军人当作“非”国

人，尽管是朝鲜军人领导了这次战斗，但他们的意识中就是中国人的胜利：“中国人可出气了，小鬼子可遭殃了。”作为朝鲜军人的许哲峰更是如此，在小说家的笔下，他已经完全可以代表中国人民；当他杀死日本侵略军佐藤的时候，他宣布道：“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这批国际主义战士确实像白求恩那样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但是，在思想意识中是否一定将自己完全等同于中国人，然后千方百计消除身处异域之感，这是一个问题。历史上的军事策略和政治方针曾为这样的“无我”提供了某种背景依据。作为军事策略，据历史资料显示，在大敌当前，乃是朝鲜军人自觉放弃独立于中国抗日军队的想法，特别是金日成领导的共产主义抗日部队，在中国东北等地区主动要求编入中国的抗日部队。他们的认识是：随着今后形势的成熟，单独组织朝鲜人民军，返回朝鲜进行独立斗争是必然的。但目前因斗争环境和条件不具备，强行分开就会削弱中朝两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因此不宜分别建制朝鲜人部队和中国人部队。⁴许哲峰等人参与中国新四军的历史事实应该以此为历史依据。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方面言之，以苏联为主导的共产主义世界确实要求各国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甚至在一般的事务中都弱化自己的民族背景和国家意识，以“工人阶级无祖国”的胸怀和气度参与到现实的国际政治与残酷斗争，于是，作为中国抗日力量的东北抗日联军北野营党支部在转战苏联境内之际，就完全认同苏联作为自己的祖国，并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我们的光荣首都”；⁵这样的认同可以用来比附当年朝鲜共产党军人在中国的国家认同，因此他们确实可以在政治上“代表”中国人民。

更重要的是，从军事到政治强调朝鲜军人如此亲密无间地汇入中国的抗战序列，给了文革意识形态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化甚至毛泽东思想普及化以基本的历史支撑，使得作品中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境界冲淡最终取代国家、民族意识成为可能——可惜的是，在面对抗击侵略者的思想主题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往往是最具有魅力和感动力的，可惜，《连心锁》尽可能地放弃了这样的魅力和感动力的追求。

对于许哲峰这群国际主义英雄来说，从编制到思想再到情感完全融入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小说赋予其人格力量及其价值内涵的关键因素。军队编制的融入是历史的决定，这样的事实无可怀疑，这同样也构成了小说的真实性基础。作者之一的克物本来就是《连心锁》所表现的部队的一员，他的人生经历和战斗经验不应该受到怀疑。这支军队应是在1942年冬季淮北反“扫荡”斗争中应用转战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四师，⁶该师当属彭雪枫、张震、肖望东的部队。⁷这个军队中的这群朝鲜军人的思想非常自觉地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洗礼，这是这部小说着力表现的文革式的思想境界的体现。在作品中，这些朝鲜军人从没有将毛泽东当作国际友人看待，而自始至终将他看作自己的伟大领袖和精神导师，提到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语言没有一点国际人士的口吻和意味。许哲峰给妻子安蓉淑的信这样说：“今后的任务就是加强边境的对敌斗争，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说到毛泽东的时候甚至没有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之类的定语，对毛泽东领袖般的尊重和太阳般的崇敬使得他们在表现上与中国军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毫无二致。安蓉淑也是如此，小说中写道，在游击战进入艰苦的坚持阶段时，“蓉淑一个人在屋里，拿着一本油印小册子，聚精会神地在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太阳已经下山了，她还全神贯注在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上。”学习毛主席著作使得她战胜了困难：本来“蓉淑觉得身上像压了一座大山似的沉重。但她没有被困难吓倒，她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小说中，讨论问题的时候，朝鲜人许哲峰甚至能用一段一段的毛主席语录与方炜对阵。相比之下，方炜作为一个中国军队的党的领导人，倒反而处于某种弱势。转战外地三个月来到根据地刘家郢之后，许哲峰给乡亲们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们离开刘家郢地区三个多月了，在这三个月中，你们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完全是政委或教导员所应该阐发的政治抚慰和意志激励，其中说到“党的领导”时没有丝毫的国际概

⁴ 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页。

⁵ 《北野营中共支部委员会关于四个月的工作总结报告》，《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⁶ 见王辅一主编：《新四军事件人物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⁷ 见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念，更无论故国意识和自己的民族情怀。相形之下，方炜作为教导员到无所事事似乎也无话可说，他常常只是对许哲峰的妻子表示出特别的关心：“蓉淑，我只愁着你的身体……”

有时候，小说中也写到朝鲜军人对自己的领袖金日成的崇敬之情，但所有的崇敬都不过是对毛泽东崇敬的一种翻版。小说追忆到许哲峰的父亲许义纯自发与日寇进行秘密战斗的历史，“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伟大的领袖，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他们的斗争都遭到失败”；“不久，许义纯带着一批青年，加入了金日成同志亲手创建的第一支朝鲜人民武装”，从此走向了胜利与阳光。这方面的叙述非常之干瘪，是因为完全建立在文革话语的抽象观念上，完全仿照对毛泽东大救星的时代认知。有时候，这批朝鲜英雄的话让人们感到，他们在思想和情感上实际上对毛泽东更亲，更崇拜。许哲峰有一段颇深刻的心得：“马列主义给了我们必胜的信念，我们一定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朝鲜共产主义者在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斗争旗帜，已把朝鲜人民反对日寇统治的解放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金日成同志创建和直接领导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已经在朝鲜广大人民群众心里深深扎了根，千千万万朝鲜优秀儿女，都在英勇不屈地为光复祖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战斗。它是我们全体朝鲜人民的希望，正如毛主席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很快就能解放祖国。”毛主席前面不需要加任何定语，也无需国际礼节式地改称毛泽东同志，完全是自己人的对待，倒反而金日成要加上“同志”。

对于毛泽东更加亲密无间的认同一方面基于思想的折服，一方面缘于情感的认同。小说没有也不能够厘清朝鲜军人对于中国人民及其伟大领袖的深挚的感情从何而来，反正这样的感情驱动着他们愿意为中国的抗战事业献出自己的全部直至生命。许哲峰在与妻子在自己的房间交谈，就充满深情和真情地表示：“我们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能作出贡献，‘鞠躬尽瘁’，无论是流血，是牺牲，我都在所不惜，而且把它看成是最大的幸福和欢乐！”如果无法交待出这种深挚情感的生命源泉，这样的表态便显得空洞而虚张。最实在和最真挚的情感应该建立在民族精神和个人情感记忆的基础之上，将一群外国人（即使是同志和兄弟一般的国际友人）从他们的个我情感中抽象出来，从自己的民族情感中超脱出来，完全抽空了他们赖以生长和发展的空域背景，人物情感以及作品思想的真实性、生动性和深刻性必然趋于崩解。

无须苛责文革话语中的作者，他们创作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们只能这样处理这一特殊的文学题材。不过从写作方法上指出这样的作品的要害，较之简单的政治反思和批判更有利于总结文学的经验与教训。《连心锁》思想浅泛、人物形象有欠生动的要害在于，政治意念冲淡了并最终删除了人物和情节的故国关怀和民族情怀，而由于作者的隔膜难以进行并最终完全取消了朝韩故国的空域背景描写，是创作方法意义上的重大缺失。